

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再体认

——评崔云伟《现代中国文学史论》

王 金 胜

(青岛大学 文学院,山东 青岛 266071)

中国新文学已有百年恢弘历史并形成了伟大传统。如何理解新文学与现代中国的深刻关联,如何阐释新文学中包含的作家思想、情感和审美体验,新文学是如何被“读者”所接受、阐释和评价的,其价值、意义或局限、不足,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,被发现、解读甚或被“误读”的?如何在我们所处的当下情境中,评判和叙述新文学传统?不断浮现的问题,对我们的精神、心灵和智慧提出持续的挑战。崔云伟教授的《现代中国文学史论》(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,以下简称《史论》)即是直面这一挑战,在此“问题”催逼下的产物。作者以深入、细致和别具一格的解读对“中国新文学传统”做出了独特而富有建设性的学术建构与体认。

首先,作为“中心问题”的鲁迅文学及其谱系。无“经典”,则难成“传统”。新文学既称“传统”,自以经典作家作品立其根基。已有的文学史论著常以鲁迅作为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和标志性作家,甚至将“新文学传统”内涵界定为“鲁迅传统”,《史论》同样给予鲁迅崇高的思想和艺术评价,并以8章的篇幅专论鲁迅,涉及生平研究、思想与精神研究、经典作品解读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研究等。在这方面,《史论》的突出特色有三:其一,与西方现代艺术之深层关联的研究。其二,有关史料的稽考和作为一门学科的“鲁迅学”的学术史梳理和考辨。其三,对鲁迅与现当代著名作家精神与艺术关联的发掘。

作者之所以将鲁迅作为新文学的“中心”问题,除了鲁迅及其文学本身具有的思想与灵魂的“深”、艺术创造境界之高度等因素外,也在于作者对鲁迅的深具个体生命感的独特体认。在作者心目中,鲁迅呈现为“三重镜像”:一是“孤独的精神界之战士”,“一个真正丰富和发展成熟了的个体”,一个常

被悲哀、孤独和寂寞所纠缠却以独立、反叛的精神和强大的生命意志,感召着包括作者在内的众多读者的伟大灵魂。二是“真的知识阶级的杰出代表”,一个坚守理想信念、不满于现状,不对权势屈服的文学知识分子,一个对弱势群体“哀悲而疾视”的人道主义者。三是“人类前行的精神导师”,既对现实葆有一份弥足珍贵的人间情怀,又能超越功利、世俗和有限,在博大中守护一片宁静与恒久。

其次,以“大文学”史观观照经典作家,拓展、深化对文学“经典性”的认识。《史论》有着清晰的严肃文学立场,却不拘泥于封闭的既有研究格局和方法,坚守中有延伸,秉持中见活性。作者注重将“文学”置于哲学、宗教、文化视阈中,做深而广的研究。第2章深入辩正鲁迅与佛学的关系,特别阐释和强调鲁迅和佛陀作为“互不相同的超越模式”的一面,指出鲁迅执意活在“现实”“人间”,以战斗于“无物之阵”的方式来实现“向下超越”的人间情怀,“从根本上否定了涅槃寂静”的佛陀。深层观之,二者之不同,恰是传统/现代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。此差异亦是作为“现代”中国作家的鲁迅之所以能够成就自身“现代”品格的思想根源。第3章探讨文学与哲学的关系。作者以萧红文本为案例,剖析其中的存在之思,认为萧红是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存在主义文学创作大家”,一方面她对人生有着虚无主义的本体性认识,另一方面亦有执着于现实存在而“反抗绝望”的生命意志。《史论》对萧红的重读,既是对萧红的发现,也是对作为“中心”问题的“鲁迅谱系”的重构。

作者对新文学与“艺术”关系论述亦新见迭出,论域涉及作家、史料研究和学术述评,足见用力之勤之深。第1章以《野草》和《故事新编》为中心,专论鲁迅与西方表现主义油画的关系。作者认为,鲁迅

[收稿日期] 2017-05-20

[基金项目]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莫言的中国主体重建与新文学传统研究”资助(编号:17BZW159)

[作者简介] 王金胜(1972-),男,山东临朐人,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,文学博士。

作品的绘画性既与鲁迅的精神气质、个性特征契合,深蕴鲁迅的精神与灵魂,又是独特的视觉审美艺术创造,是主体—叙事—形式的内在统一。经过细致考察,作者发现,鲁迅作品中的油画线条充满力量之感,它和强烈的笔触、绚烂的色彩共同构成了“漩涡”意象。鲁迅作品中的色彩具有鲜明冷暖对立特征,两大色系相互争夺,与鲁迅“反抗绝望”的精神哲学确有相通之脉。鲁迅创造了生命与死亡两大意象群落(生命意象与凡·高相比,死亡意象与蒙克相比),还创造了类似罗丹雕刻中的“行者”意象,这一意象是对生命意象的升华,对死亡意象的超越。透过作者对鲁迅作品与西方表现主义油画之深隐关系的追索,我们不仅看到鲁迅思想、意识和审美中的深层存在,也鲜明地体味到作者进入和穿越鲁迅精神之河流时,生发和激荡着的发现快感和收获的喜悦。在此,鲁迅形象由模糊渐次清晰,又由清晰倏然转入模糊,鲁迅灵魂和美感世界的某些侧面,连同鲁迅及其研究中的某些可能性被敞开了。

再次,《史论》蕴含着新文学传统建构和重构中不可或缺的科学性品格。该著在史料文献上下了极大的功夫,通过悉心搜罗和用心组织,将散乱的“死材料”转化为“活文本”,使创新之“论”获得扎实、确凿的“史”之支撑,论从史出,避免了以论带史的误区。在“鲁迅与西方表现主义美术关系略考”中,借助鲁迅日记、讲演、书信、购读、收藏、举办画展等诸多史实,对其理解与接受表现主义美术的广度和深度,做了深入细致的全方位考察。论述以文学与美术之关联为着眼点,以对美术理论文本和美术作品文本的解读为根基,既把握和揭示了文献之本意与史事之本相,又透过表象探究了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,可称史料研究的典范。在“1981-2011:‘鲁迅与美术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”中,则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此前研究中的种种不足与局限。这对于相关领域的研究无疑是一种必要的提醒和警示。如果说上例尚属史料稽考与学术评判的宏观研究,那么,关于鲁迅与毕珂夫画作/文本之关联的考辨,则是典型的微观研究。作者多方引述萧红散文、戈宝权的史实考证等资料,从绘画技法和意境着眼,对画作做精微的论析,不仅以多方史料辨明、澄清了被认为是包含着鲁迅“自己心灵的隐秘”的问题,将其落到实

处,更以对画作/文本的细读,发掘木刻版画与鲁迅审美趣味的关系,及其发展新兴木刻的内在理路,从而进一步将问题落到“深处”。作者秉持严格、审慎的学术态度,不跟风逐潮,不惟“大家”“名家”马首是瞻,这在“林贤治《人间鲁迅》中的史料失误”和“鲁迅研究中的引文注释问题”两章中表现得极为突出。不同于某些“苛评”“酷评”,作者的态度是科学求真的,也是与人为善的。

最后,《史论》的“当代性”“主体性”品格亦清晰可鉴。“2011-2015 年鲁迅研究中的争鸣”和“2000-2010:鲁迅与当代中国研究述评”,直面新启蒙主义、文化保守主义、自由主义和世俗消费话语中的“鲁迅镜像”,以“鲁迅”为症候点观照、评判当代中国思想与文化现实,反映出作者学术研究中“长时段”历史眼光和鲜明的当代性与启蒙主体性品质。第5章借用新历史主义的某些观点,以钱理群、洪子诚的文学史著为个案,从文学史观、文学史叙述方法等方面,研讨文学史研究和撰述中历史/当下、主体/客体、历史/话语、微观/宏观等对子之间的关系。这同样是宏观/微观研究、文本解读/理论阐释、当代性/主体性结合的范例。

《史论》包含着作者对书/自我、知识/心灵、理论/鉴赏、学者/艺术家等诸种关系的深切体味。在作者的学术构想中,理想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或许应具有如下风貌:有扎实、确凿的史实/史事为根基,有对典型场景与细节的精心选择,有当代主体的充满个体化历史想象力的适度发挥。它既应是一部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、精神史,亦应是一部美而深、灵而实的艺术史,是关于心灵、精神、灵魂之艺术的具有想象力、感悟力和穿透力的重现和再体认。这自然也是本书的学术风格和作者追求的学术品格。

自然,《史论》并非完璧,尚存一些问题可做进一步探析。如以“鲁迅(传统)”为思想核心和论述线索,自有充分理由与合理性,但是否也于无形中遮蔽了新文学更为驳杂的内涵?《马桥词典》中民间/世界/政治与民间性/神性/现实性,如何“文学”地建构了一个怎样的“中国”镜像?这关系到如何理解鲁迅与韩少功之间的思想—文学谱系问题,联系着“中国”“文学”自“现代”到“当代”的某些线索,颇可深究。